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13

2008年2月1日

\*\*\*\*\*

## 毛澤東思想的精華 — 新民主主義論 — 兼談姓社還是姓資？姓“新”！新民主主義！ 顏色革命，什麼顏色？不必橙色，小心紅色。

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

哈佛大學燕京學社協作研究員

姚監復<sup>1</sup>

毛澤東說：“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封建主義為第一。”

“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有好處沒有壞處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他們‘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呢，他們變成了反革命。”<sup>2</sup>

<sup>1</sup> 本文寫於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發表40週年之日 — 作者註。

<sup>2</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275、323頁。

近年聽到英美等外國學者談論中國政治經濟形勢，包括顏色革命和姓社姓資問題。現將一些觀點和相關思考及引文提出，提供參考、分析和批判。從這些議論與思考中，一個值得重視的結論是：當前需要重新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新民主主義論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理論。

## 一、鄧小平說：“中國最關鍵的問題是穩定”，指出有“九億多人要革命”、“出現內戰局面”的危險

國外有位學者說，中國領導人強調和諧、穩定、發展和和平崛起是正確的。但是，對自己的成就津津樂道、沾沾自喜，“大好形勢”、“世界第一”，這種好表揚、好表現的性格，有可能忽視政策的負效應和潛在風險，而且，反映出內心虛弱、恐懼和缺乏自信。而有自信的國家敢於在報刊講問題：黑暗面、災禍和面臨的與潛在的危機，公開討論處置方案。實際上，鄧小平就敢於承認可能出現人民要“革命”、“出現內戰局面”的危險，要居安思危。學者們注意到鄧小平說過：“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中國有 11 億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億多人富裕，相應地有九億多人擺脫不了貧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億多人要革命。所以，中國只能搞社會主義，不能搞兩極分化。”<sup>3</sup> “中國最關鍵的問題是穩定，中國亂不得。中國亂起來，不僅是中國問題，也不僅是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問題，會影響整個世界。中國一亂，將會出現內戰局面，難民往外跑，周圍國家都要受影響。”<sup>4</sup> 外國學者認為鄧小平不愧為高水平的政治家，具有清醒的頭腦，預見到出現危機的可能性。

## 二、中國有“顏色革命”的風險，但不會是“橙色革命”

外國學者注意到在原來蘇聯領土上的幾個獨立國家，從烏克蘭到格

---

<sup>3</sup> 《鄧小平年譜》，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 年，第 1317 頁。

<sup>4</sup> 《鄧小平年譜》，第 1314 頁。

魯吉亞一直到中國邊境的“斯坦”共和國發生了“橙色革命”，推翻了原共產黨人領導的政權，美國新聞界稱之為“橙色革命”。國外學者注意到，這一波“橙色革命”的前臺是穿著“橙色”上衣的群眾，示威遊行時的“橙色”海洋，但是在烏克蘭等國後面都有原來的克格勃和後面的頭頭在指揮、策劃和操縱，並不是什麼知識分子當領導人。至於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民主人士，供給活動經費，只是外因，並非決定因素。馬克思主義認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橙色革命”實際上反映出這些國家群眾對經濟改革的進度和效果不滿意，要求私有化更快點，市場經濟更開放些，也幻想私有化以後人民能迅速富裕起來，分配更公平，因而要求政治變革，撤換政治家，出現了“橙色革命”。

國外有的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出現“橙色革命”的需求、條件和可能，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私有經濟和引進外資的水平遠高於“橙色革命”的國家。中國有“顏色革命”的潛在風險，可能出現的是：與市場經濟反向的“紅色革命”，而不是“橙色革命”。我可補充的事實是，國內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又具有長期行政領導工作經驗的老黨員，2005年曾經對我講過：“中國沒有必要搞‘橙色革命’。”他認為：出現“橙色革命”的國家在經濟上最終要求就是私有化、市場經濟化、對外開放。這些“橙色革命”的目標，在中國已經實現了。中國包括私有經濟的非國有經濟早已超過了國有經濟，只是正式統計沒有公佈。<sup>5</sup> 2003年城鎮就業人員25639萬人中，國有單位只佔6876萬人，佔26.8%。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產品銷售收入58070.9億元，而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的產品銷售收入為42150.9億元；利潤總額分別為3783.5億元和2680.5億元；稅金總額分別為4615.3億元和1267.3億元，外資企業利大稅少銷售收入高。<sup>6</sup> 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額佔GDP的百分比）已超過60~70%，亞行一位專家認為，外貿依存度

---

<sup>5</sup> 2005年城鎮就業人數75825萬人中，國營單位就業人數為6488萬人，私營企業為3458萬人，個體企業為2778萬人，外商投資單位為688萬人，港澳臺商單位為557萬人（國家統計局編：《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年9月，第128頁）。

<sup>6</sup> 國家統計局編：《2004中國統計摘要》，中國統計出版社2004年，第42、132頁。

反映一個國家經濟捆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戰車上的緊密程度。2004、2005年作為農業大國的中國，農業進出口按價格計算連續兩年出現逆差。克林頓說：“在中國要加速大型國有企業的衰亡，由私營企業取而代之。”弗里德曼說：“中國改革的惟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場經濟。這個目標已經基本實現。”這種情況下，中國還有必要搞“橙色革命”嗎？提高私有化、市場化、開放水平為目標的“橙色革命”的橙色在中國還不夠濃嗎？

有一位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領軍人物”的學者在2003年對我講過：“中國的民主化要一百年！”“要從公民課本做起，進行公民教育。”他不認為也沒任何意願現在要在中國搞“顏色革命”，既不是搞經濟上的“橙色革命”，也不是搞政治上的“橙色革命”，他真心地想為中國人寫公民讀本，普及公民意識，要搞教育，人的現代化。還有一位“資產階級自由化”、“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寫了一本書，書名就是《告別革命》。連革命都要告別了，還搞什麼“橙色革命”。

所謂“左派”和“右派”的代表人物都親口對我講，現在不必要“橙色革命”，不可能馬上就民主化。不知道為什麼和什麼人把“橙色革命”炒作得活靈活現，不知是無中生有還是有意誇大“藍鬍子”、“狼來了”的故事嚇唬小老百姓和天真官員。

### 三、中國應警惕“紅色革命”：

左派揭露“在教堂裡反對聖經”的真相後，是否會引發動亂

國外學者認為，鄧小平最擔心的兩極分化危險，實際上是國內外公認的中國的現實狀況。城鄉差距不斷擴大，貧富差距嚴重，幾乎是世界上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基尼係數0.43，早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按鄧小平理論，兩極分化了，就失去了社會主義的前提。而中國仍然堅持現在的中國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還要進行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堅持共產主義人生觀、世界觀。這樣出現了黨的宣傳教育同兩極分化的現實生活反差極大、非常矛盾的尷尬局面。英國一位教授形容這

種戲劇性的中國政治現實，正是在“基督教的神聖教堂裡反對神聖的耶穌和聖經。”“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左派的危險就在於他們正像安徒生童話中的天真小孩，揭穿了皇帝的新衣的真相：神聖的皇帝沒有穿衣服。飽受兩極分化之苦的一部分弱勢群體，從自己切身體會、感受中很容易接受左派的揭露真相的說法是符合生活實際的，也是符合他們的理想與願望的，更感到符合真正原版聖經馬克思主義的”。網上有歌頌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國內有不加批判、沒有懺悔地深情回憶“四清運動”中揪出最小的走資派——一個農民，桃園支部書記的文章。一位外國朋友、相信毛澤東文革理論的老共產黨員向我激動地吼道：“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就是搞早了。現在搞正好，一抓一大把走資派。”這樣就存在著鄧小平擔心的兩極分化引起革命和出現內戰的思想土壤，也令人擔心在一定條件下會不會出現以反對兩極分化的經濟口號為主要內容和動因，由極左派重新高舉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旗幟，動員起弱勢群體反對經濟精英、知識精英、政治精英組成的特權階層，反對特權資產階級、反對修正主義，發動第二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潛在的和現實的危險是可能出現“紅色革命”。這樣看來，鄧小平擔心出現革命和內戰的危機感具有現實意義和科學的預見性。毛澤東在臨終前特別講到文化大革命，共產黨的“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不成就動蕩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sup>7</sup>因此，對於可能出現的“顏色革命”，更值得擔心的是“紅色革命”。要採取的對策只能是及時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正確的符合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經濟改革。

#### 四、用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理直氣壯地 回答“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

毛澤東說過：“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有好處的。”“民粹派要

---

<sup>7</sup>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 年 2 月，第 178 頁。

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結果呢，他們變成了反革命。”

“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封建主義為第一。”<sup>8</sup>

國外學者認為：“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實際上從五四以後就在中國開始爭論了，“不爭論”是假的，掩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質，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左派不過挑明了真相，戳穿了皇帝的新衣是空氣、口號而已，為了蒙蔽民衆和保持自己革命良心的平靜而已。從建國伊始的思想改造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反右派運動、農業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反右傾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開放 20 多年的理論爭論、政策爭論和一次又一次地清除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新自由主義運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小革命”，始終貫穿著一條紅線，雖然運動名稱不斷變化、口號不同、形式各異而實質上始終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無休止爭論。

他們建議解鈴還須繫鈴人，可以用 1949 年以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的理論，回答 1949 年以後毛澤東提出的“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因為晚年、甚至中年毛澤東離開了正確的毛澤東思想的華彩樂章——新民主主義論。既然要四個堅持，要堅持毛澤東思想，就應當堅持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堅持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新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正確理論、堅持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即國家資本主義的正確決策與理論。馬克思主義認定，只有幾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動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成功。馬克思從來沒有說過落後的封建專制的中華帝國，可以跳過資本主義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列寧也沒有說過中國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建成社會主義。即使加上四個較小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一定能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包圍中建成社會主義。這樣，中國領導人完全可以用新民主主義論理直氣壯地回答“姓社還是姓

---

<sup>8</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 323、275 頁。

資”的問題，跳出“教堂裡反對聖經”的尷尬怪圈，不必羞羞答答的猶抱琵琶半遮面地講資本主義、資本家入黨、按資分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社會主義”了。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才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穿上社會主義這件皇帝的新衣，仍然是資本主義。西方諺語說：“叫起來像鴨子，走起路來像鴨子，那麼它就是鴨子。”

其實，最近一些年公開出版的《毛澤東文集》中公佈了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秘密報告，已經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武器，可以用來緩解和回答左派的指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323頁上刊載的毛澤東1945年4月24日在黨的七大的口頭報告指出：

我們這樣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是有好處沒有壞處的。對於這個問題，在我們黨內有些人相當長的時間裡搞不清楚，存在一種民粹派的思想，在農民出身的黨員佔多數的黨內是會長期存在的。所謂民粹主義，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經濟發展到社會主義經濟，中間不經過發展資本主義的階段。俄國的民粹派就是這樣，當時列寧、斯大林的黨是給他們以批評的。最後，他們變成了社會革命黨。他們“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會主義、不發展資本主義，結果呢，他們變成了反革命。布爾什維克就不是這樣，他們肯定俄國要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對無產階級是有利的。列寧在〈兩個策略〉中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其說對資產階級有利，不如說對無產階級更有利。”我們不要怕發展資本主義。俄國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後，還有一個時期讓資本主義作為部分經濟而存在。而且還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佔整個社會經濟的百分之五十，那時糧食主要出於富農，一直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才把城市的中小資本家與鄉村的富農消滅。我們的同志對消滅資本主義急得很，人家社會主義勝利了，還要經過新經濟政策時期，又經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第二個五年計劃時，集體農莊發展了，糧食主要不是由富農出了，才提出消滅富農。我們的同志在這方面是太急了。<sup>9</sup>

1945年3月21日毛澤東還說過：“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

---

<sup>9</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323頁。

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封建主義為第一。”<sup>10</sup>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已經提出了並且在 1949 年他領導制定的《共同綱領》體現了“肯定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的重要決策和理論，為走向繁榮富強的新中國提出和制定了一系列的具體政策。這是值得繼承的重要財富。鄧小平一再講，現在中國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不合格”，就是不及格，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還不是社會主義。說不清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堅持？堅持什麼？還不如堅持新民主主義。毛澤東生前已為第三代和後代的領導人留下了錦囊妙計、護身符和真正的毛澤東思想：理直氣壯地堅持發展資本主義的最高指示。為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而奮鬥吧！值得爭論的不是“姓社還是姓資”，而是如何防止兩極分化，防止產生權貴資本主義，防止出現野蠻的壞的資本主義。研究採取什麼更高明的方法、政策、戰略，近期的和遠期的目標和過程，更不必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外衣遮蓋造成擴大兩極分化的某些具體政策、辦法，錯誤地認為任何所有制的經濟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部分，而方便促進權貴、買辦資產階級的形成。但是，要肯定現在發展資本主義，承認實際是新民主主義，正是堅持毛澤東思想。

## 五、恩格斯 1853 年的預言不幸言中了

對於退到新民主主義，是不是政治上的倒退，有人有所顧慮。國內外學者注意到恩格斯早在 1853 年前就預見到，執政黨被過去所發表的被曲解的口號所約束，可能過急地要求在人間的此岸實現彼岸的天堂的共產主義者，將會採取不符合客觀實際和歷史發展規律的過激的革命行動與措施。最終要造成事與願違的悲劇，通向天堂之路打開了進入地獄之門。恩格斯在 1853 年 4 月 2 日致魏德邁的信中寫道：“我們的黨有一天不得不出來執政，而歸根結底是在實行那些並不直接符合我們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利

---

<sup>10</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 275 頁。



益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無產階級大眾壓力下，由於我們自己所發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黨派鬥爭中多少帶著激昂情緒提出來的聲明和計劃所約束，我們將不得不進行共產主義的實驗，並實行跳躍，但這樣做還不是時候，這一點我們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這樣做，我們會丟掉腦袋——但願只在肉體方面——就會出現反動，並且在全世界能夠對這種事情做出歷史的判斷以前，我們不僅會被人視為怪物（這倒無所謂），而且會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還能有什麼別的結果。”<sup>11</sup>

外國學者有疑惑地詢問：中國有四千年的文明歷史，中華民族是世界上一個優秀民族，歷朝歷代領導人中有很多位英明君主，中國數不清的思想家、藝術家和詩人給後代留下了世人讚頌的值得繼承的充滿智慧的文化遺產，為什麼近百年來，中國也出現了恩格斯預言的“笨蛋”和“怪物”呢？難道21世紀的中國人跳不出恩格斯預言的歷史週期律嗎？非要走上被恩格斯稱作“怪物”、“笨蛋”的不怎麼光彩的仕途嗎？未來的歷史將以這樣不光彩的稱號還是用更高尚的語言評價判斷21世紀的中國人呢？如果中國人不再堅持不是時候的跳躍，放棄那些激昂情緒、頭腦發熱時提出來的口號（如共產主義人民公社、幾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真正落到新民主主義的現實土地上，心口如一、名實相符，真正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才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智者，而不是怪物和笨蛋。

但是，在當前，中國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四項基本原則”中最主要的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鄧小平指出：“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sup>12</sup>

將中國人1953年開始用起的“社會主義”名詞，改換成“新民主主義”是否違反了原則、犯了王法呢？不是！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太窮，農村太窮，農民太窮。1978年以前，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每年只有60元，在田裡幹活時，衣裳上掉了一個扣子，農民也感嘆：

---

<sup>11</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3月，第587頁。

<sup>12</sup>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261頁。

“一天的工分全丟了！白幹了！”因為，一天的工分只值五分錢。在人民公社剝在一起受窮，絕不是馬克思、恩格斯定義的社會主義，也不是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社會主義，根本不是社會主義！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自封的自以為是而不自以為非的所謂社會主義，退回到新民主主義，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要求的實事求是，正是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

## 六、對 28 年改革中的正負效應需冷靜反思

外國的學者說：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1 年人類發展報告》，<sup>13</sup> 曾經公佈過各國收入不平等的定量指標，1998 年美國 20% 的收入最高人群佔全部收入的 42.4%，而中國竟超過了美國，達到了 42.6%。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另一個重要指標基尼係數，中國已經超過了 0.4 的警戒線，有人估計達到了 0.43 的危險水平。中國改革 28 年來在經濟發展上確實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是社會發展、生態保護和政治民主相對滯後，特別是對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同時，忽視對一部分人相對困難、貧窮的問題重視不夠、解決得不夠及時。對於改革中必然會出現的風險、危險，當然需要正視，應記取列寧的警告。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和租讓制，就是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範圍的國家資本主義（相當於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同時指出了可能引起的危險：“至於這個政策在一個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而且是一個落後的弱國會引起什麼危險，我們絕不能視而不見。只要我們蘇維埃共和國還是緊挨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裡的一個孤立地區，那種認為我國經濟完全可以獨立和各種各樣的危險已經消失的想法，就是十分可笑的幻想和空想。當然，只要這種根本對立還存在，危險也就存在，並且不能避免。我們只要站穩腳跟，就能克服這些危險，要善於把較大的危險和較小的危險區別開來，寧願承受較小

---

<sup>13</sup>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1 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2002 年，第 180 頁。

的危險而避免較大的危險。”<sup>14</sup> “國家資本主義對於我們可怕不可怕呢？不可怕，因為我們會確定實行租讓的限制。”<sup>15</sup>

列寧還尖銳地指出將要出現收入差距拉大的危險：“我們目前經濟現實中的矛盾比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前要多，居民中某些階層即少數人的經濟狀況有了部分的、些許的改善，但是另一些階層，即大多數人，他們得到的物質資料同他們的基本需要則完全不相適應。矛盾增加了。不難理解，在我們經歷大變革的時候，要一下子消除這些矛盾是不可能的。我們還沒有掌握這個領域。”<sup>16</sup> “我們應該學習。應該學習由國家調節商業關係。這項任務是困難的，但絕不是無法完成的。”<sup>17</sup> 列寧指出，新經濟政策所造成的情況，“都意味著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看不到這一點，那就完全喪失了清醒的頭腦。不言而喻，資本主義關係的加強，其本身就是危險性的增強。你們能給我指出什麼沒有危險的革命道路，沒有危險的革命階段和革命方法嗎？危險的消失就意味著戰爭的結束、無產階級專政的終止。當然，此時此刻我們誰也不作這樣的夢想。這個新經濟政策所採取的每一個步驟都包含著許許多多的危險。”<sup>18</sup>

因此，放棄戰時共產主義的政策，實行新經濟政策，正是列寧提出來的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政策。中國應該徹底放棄人民公社化的後遺症，但是不要誤認為堅持人民公社式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口號才是革命者。要承認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符合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正確決策，事實上是實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中國化。

堅持對生產力發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改革開放政策，重新認識新民主主義論的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正是堅持列寧主義、堅持列寧當年勇敢地對理論作創新式發展，提出新經濟政策的革命風格。

---

<sup>14</sup> 《列寧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5頁。

<sup>15</sup> 《列寧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0頁。

<sup>16</sup> 《列寧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2頁。

<sup>17</sup> 《列寧全集》第42卷，第237頁。

<sup>18</sup> 《列寧全集》第42卷，第231頁。

但是，我們必須充分清醒地看到，列寧關於新經濟政策會帶來危險，尤其是收入拉大的兩極分化的風險的警告。應當承認，在中國改革進程中，對於風險的存在和嚴重性是估計不足的。對於改革的一些方針政策的錯誤或失誤，是不夠正視的，或是不許爭論，甚至有些討論還被壓制，除了教育、醫療、國企的改革有失誤以外，例如以改革名義進行的農業科技體制改革的政策就是不成功的，脫離農業生產的特殊規律——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交織，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不一致。農業生產週期長，農業科學實驗就不同於工業的室內實驗，對收入低的農民，農業科技難於有償服務，以改革名義硬要公益性質的農業科技工作自負盈虧，只能“網破、線斷、人散”，出現不了重大科技成果。雜交水稻實際上是1972年立項，幾千技術人員合作攻關的老成果；動植物病蟲害發生時，如禽流感發作，只能殺雞，而沒有做好預防，也缺少“消防隊”。但是，科技領導部門始終不能正視和改正農業科技改革中這種對農業造成損失的失誤：違反了《農業法》、《農業技術推廣法》確定農業科技為公益性質的判斷。科技部門是否應對技術“創新”的嚴重落後負責？現在建國57年後，才發現“原創性創新”成了問題，那麼黃昆的半導體研究成果、吳仲華的空氣動力學理論到馬驥的半喂入式收穫機原理，中國農民和工程師的插秧機都是原創性創新，外國拿去用於生產，而中國為什麼沒有形成批量產品呢？20年前報上公佈了科學家的建議：引進、消化、創新的投資比例應達到1比10比100。我們的創新投資比例是多少？科委抓了星火計劃——給鄉鎮企業貸款項目的批准權，但是為什麼沒有抓自主創新的大事？抓了芝麻，丟了西瓜的責任在什麼部門？……所以，現在網上輿論對改革具體政策的批評，應當冷靜地對待、分析、研究，以熱情歡迎的態度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至於以“顏色革命”或“漢奸”、“賣國賊”的過分泛政治化的帽子對待改革中的人士，不是科學的態度，也不利於冷靜地、客觀地、認真地分析與反思改革進程中的真正的風險和應採取的對策。需要對28年來的改革進行客觀的全面的冷靜的反思，才有利於在繼續改革進程中克服風險，踏踏實實前進。

至於對黨的性質的爭論，可以說是合時宜的、不必要的、可能會引起混亂的。從極右方面提出黨是不是“合法組織”，從極左方面提出“是不是修正主義的黨”都是不合時宜的，在不合時宜的地點、不合時宜的時間提出了不合時宜的爭論題目。可以在黨的領導下、保證大局穩定的前提下對改革進行深刻的反思，認真的討論。主管部門可以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保持民主、寬容、自由的氣氛，因為胡錦濤、溫家寶最近都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現代化。給學者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民主，領導者從中擇善而從，有利於加強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減壓閥冒出點熱氣可以減壓，可以防止高壓鍋爆炸，這裡重要的只有一條：寬容比自由更重要。

## 七、縮小收入差距，制約兩極分化， 是當前值得重視的大問題

我尊敬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2005 年對我講：“‘打著紅旗反紅旗’，不如俄國‘打著白旗反紅旗’。公開承認是資本主義，就按資本主義的章程辦法實行私有化。”西德對東德企業私有化，搞資本主義，是支付鉅額成本補貼的。一個工廠可以只要一個馬克賣給私人。但是新的私營企業主必須按照原來西德法律承擔原來的所有債權債務，並對全體職工按西德的標準支付退休職工的退休金、下崗的要給予失業補貼、重新再培訓再就業要承擔培訓費。“俄羅斯的國營企業私有化，也參照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哪些企業私有化要經過哪一級政府，哪些企業不許私有化，也有明確規定。現在就害怕以社會主義改革的名義進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沒有章法、規定、具體辦法，各級領導發個紅頭文件就可以了，國有財產以改革名義變成為少數權貴私人資本，還不允許別人提出不同意見。因此，打著紅旗反紅旗，比打著白旗反紅旗還厲害，還危險。”

既然如此危險，現在又不可能退到人民公社的計劃經濟時代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在改革中又承認自己是“不合格的社會主

義”，或者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總之，按鄧小平講的，中國還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到了 2050 年，中國達到了基本實現現代化、趕上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才是真的搞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在 2049 年前，中國不是真正的搞社會主義。那麼，就老老實實承認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新式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免得左派挑剔、揭露真相：說的是社會主義，掛的是社會主義牌子，但是經濟上是橙色，是私有化，具有資本主義實質的特色。名不符實，言行不一，還不如認認真真地學習經濟發達國家防止收入差距擴大、制約兩極分化的有效措施。如國外的某些具體做法：

1、美國公務員沒有普遍使用中國式的公務車，多用私人車或乘公共交通車、打的。中國如做到此項，每年可以省三千億元公務車費，用以扶貧支農多好。

2、有的國家和地區按級發給公務員一定的交際費，按工作需要由自己支配，不像中國大吃大喝全報銷。這樣，中國每年又可省下三千億元公費吃喝錢，用來扶貧支農多好。

3、新加坡黨的幹部由黨費開支，部長不是公務員，內閣改組部長下臺後仍做黨的幹部，由黨費收入支付工資，並非終身享受部級待遇。但部長以下為公務員，不隨內閣變換而變換。

4、美國購房和租房者約各佔一半。波士頓規定每個小區內必須建有廉價的出租房和老年公寓（房價為本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如有位退休教授到美國，只有每年子女給的 1000 美元贍養費，則每年只交 333 美元房租）。利用公家土地、舊房建住宅，要留 20% 給政府，廉價出租。這樣，保證了低收入者的安居問題。

5、澳大利亞人到公立醫院看病，只要交一澳元的掛號費。看病、檢查、吃藥、住院都報銷。

6、美國義務教育免收學雜費、課本費等，還有免費校車接送兒童，中午還給貧困家庭子弟免費午餐。真正的是國家盡義務，真正的免費義務教育。

7、公共交通是政府補貼支持的，70 歲老人坐公共汽車、地鐵半價，

照顧了弱勢群體。

8、對農業科技等公益性事業，政府支持。美國農村的農技推廣員是農業部的公務員，不要求自負盈虧，不向農民索取技術服務費用，而不像中國許多公用事業也是什麼改革都市場化。

9、博物館每週都有一天免費開放，適應了低收入人群與學生的需要。華盛頓最大的科技、藝術等博物館，星期日全都免費開放。

10、私立大學收費很高，但抽肥補瘦，規定要錄取 20% 學生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由私立大學發給較高的獎（助）學金，使貴族學校不為貴族子弟壟斷。

11、向最低收入者發放食品券，有糧食、肉、奶等，保證窮人溫飽，在美國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很少有老人乞丐。而年輕的失業者要錢的倒常見，往往是對職業挑三揀四。

12、東京農產品批發市場的管理員是公務員，他們說：“收人民的稅，要為人民做事，批發市場本身不能再賺錢。”而農產品的交易活動是市場經濟行為。

13、當然，問題是：錢從何而來？收稅和捐贈。高額累進所得稅、遺產稅，可以由政府合法的收富人的稅“劫”富濟貧。富人將收入的一部分捐贈給社會或基金會，可以退稅，降低了高額累進稅的等級，少交稅，個人實際收入反而多，形成互利雙贏的結局。

14、少搞形式主義的形象工程。雅典的奧運會欠債，要 20 年才還得清，希臘農民認為，奧運會拉大了雅典與貧困地區的經濟差距。實際上，只有洛杉磯奧運會利用原來的體育場和賓館勤儉辦事賺了錢，其他奧運會商人賺了，主辦國都賠錢了。撈了個名聲，擴大了開放度。外國學者還認為，促進了政治民主，促進希特勒德國、蘇聯在奧運會十年後都改變了專制制度，也是一種促進“顏色變革”的辦法。

15、注意補貼農業、農民。20 世紀 80 年代，德國農民收入每年一萬馬克，歐盟及聯邦德國政府各補貼一萬馬克，使總收入三萬馬克，相當於城市居民收入的 75%。農業部長說是為了社會穩定。美國布什政府決定十年內為美國農民補貼上千億美元。

有些海外學者認為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縮小兩極分化和收入差距的措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化”。這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影響、演變，反向的“橙色革命”。

總之，對“顏色革命”是“橙色”還是“紅色”的討論，對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對改革的得失利弊特別是對具體政策的研究分析都是不可避免的、必要的，也是有益於決策者思考的。最後目標還是希望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受了百年苦難的中國人民能夠團結一致、艱苦奮鬥，建設繁榮富強、民主自由、社會和諧的新中國。在千年難遇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克服一切艱難困苦，讓思想衝破牢籠，讓人民掌握真理和自己的命運，使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再現輝煌，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

對“姓社姓資”的理論問題，國外學者同樣關注。現對幾個重要論點和問題介紹如後，供研究、分析和批判參考。

## 八、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治是非常豐富和多樣的。

### 政治形式沒有階級性，可以通用

有的學者認為：資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即政權採取的政策有利於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即政權採取的政策有利於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形式沒有階級性，可以通用。

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有一種認識誤區，把實質和形式混為一談。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治形式，就是“獨裁”、“一黨制”、“個人崇拜”或者就是“蘇維埃”、“人民代表大會”、“一元化領導”，或者就是“黨的國家、黨的軍隊、黨的文化、黨的思想”、“輿論一律”。而資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政治形式就是“民主”、“自由”、“人權”、“多黨制”、“三權鼎立”、“軍隊國家化”，特別是“言論出版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等被稱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形式。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再版時，在第二章中第三節增加了重要的一段話：



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其複雜，但本質是一樣的：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一定都是資產階級專政。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當然不能不產生非常豐富和多樣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樣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sup>19</sup>

可見按列寧的思想，專政的本質與形式是不同的。一個階級專政的本質是為了鞏固、保護、加強本階級的利益，一切極其複雜和非常豐富的國家政治形式都是服務於本階級的利益這個本質。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就是無產階級政權採取的國家形式和各種政策都有利於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就是資產階級政權採取的國家形式和各種政策有利於資產階級。各種形式都服從、服務於本質，本質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多種形式。相同的形式可以服務於不同的本質。例如，選舉的政治形式既可以服務於無產階級專政，也可以服務於資產階級專政；美國和中國都可以簽署聯合國的人權公約，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國家的憲法都同樣地列入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遷徙自由、結社自由”的相同字樣的條款。政治形式和經濟形式一樣，沒有階級性，“市場”、“計劃”等經濟形式，不必戴上姓社還是姓資的標籤。同樣的，對“民主”、“自由”、“選舉”、“結社自由”等政治形式和政治術語，同樣也不應更不必分成哪些姓社，哪些姓資。可以通用共享，為任何政治制度和階級專政服務，我們也不必葉公好龍，對自己沒信心。

反之，自認為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就誤以為所有的政策都是有利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都是社會主義的必要補充，都有利於工人階級和農民。實際上許多具體政策並非如此，如80年代國家供應泰國正大公司生產飼料的原料玉米價為平價，而供應農民協會的希望牌飼料公司的玉米價為議價，高於外商。外資企業的稅率低於國營企業的稅率；私營企業列入“公司加農戶”名單就可得到國家的一系列的優惠政策，而農民的合作社性質的協會就得不到平等的優惠待遇，起點就不平等。而這些具體經濟政策正好反映出究竟是不是反映

---

<sup>19</sup> 《列寧選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23頁。

出和體現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忽視了對哪個階級有利這個本質，只抽象地、形式主義地反對“三權鼎立”、“資產階級自由化”、“新自由主義”等政治形式，忽視了實際生活中有的經濟政策有利於出現“兩極分化”，有利於資產階級，包括國外資本家的結果。

因此，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本質仍然需要討論，要分析各種政策究竟對哪個階級有利。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左派或右派，都一致承認列寧的論斷是正確的：“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已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現實生活的實踐所證實。不必迴避這個現實，而是以正確政策對待，及時、適當地採取相應的防範措施，防止兩極分化過度，誘發出現社會動蕩的潛在危機和現實危機。但是，對一些可以通用、共享的政治形式，包括直接選舉、差額選舉、三權或五權分立等等，不必視之如鬼神，敬而遠之。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都可以差額選舉，並沒有出現黨內分裂和混亂。中國為什麼不能在政治體制改革上走得更快一點，步子邁得更大一點，主要是膽子要更大一點，對自己的信心更強一點。

有位哲學家說得好：“馬克思主義不是法律，法律要人服從。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宗教讓人膜拜。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科學需要人去研究和發展。”

## 九、列寧以“革命階段論” 批判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

列寧主張“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東西”，是歷史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列寧反對托洛茨基的無產階級要獨自革命下去、混淆不同階段、不斷地革下去的“不斷革命論”。在列寧的“兩個策略”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嚴格地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劃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歷史階段，而提倡“不斷革命”的恰好是原蘇聯、俄羅斯和中國的托洛茨基和中國的托派。歷史令人驚奇地開了一個大玩笑：在1952年12月21日斯大林生日那天，中國的托

派分子全部被捕，關在中國監獄裡。1979年鄭超麟等才有公民權，托派至今未平反（只在《毛澤東文集》的註釋中悄悄地改變了對托洛茨基的定性）。但是，毛澤東卻沿用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的提法，在1953年認為1949年10月1日就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斷宣傳“不斷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要繼續革命。

1905年7月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指出：

我們大家都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截然不同的東西，我們大家都無條件地堅決主張必須把這兩種革命極嚴格地區分開來。但是，難道可以否認前後兩種革命的個別枝節成份在歷史上互相交錯的事實嗎？難道在歐洲民主革命的時代沒有許多社會主義運動和爭取社會主義的嘗試嗎？難道歐洲不是還有許許多多民主主義性質的事情要由將來的社會主義革命去最終完成嗎？<sup>20</sup>

把小資產階級為完全的民主革命進行的鬥爭和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革命進行的鬥爭混淆起來，有使社會主義者遭到政治破產的危險。馬克思的這個警告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恰巧由於這個原因，“革命公社”的口號是錯誤的，因為歷史上有過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淆起來。反之，我們的口號，即無產階級和那些農民革命民主專政的口號，能完全保證不犯這個錯誤。我們的口號無條件地承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認為它決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範圍，但是它同時又把當前的這個革命推向前進，努力使它具有一個最有利於無產階級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無產階級下一步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得以順利進行。<sup>21</sup>

可見，列寧要求極嚴格地區分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為毛澤東提出的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兩種性質上截然不同的革命。兩種革命中只有“個別

---

<sup>20</sup> 《列寧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7頁。

<sup>21</sup> 《列寧選集》第一卷，第578頁。

枝節成份”在歷史上互相交錯，而不能把性質不同的兩種革命過程混淆在一起，畢其功於一役。

托洛茨基對於俄國是否跳過資本主義革命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革命的回答是：“不斷革命”。他在1922年寫的《1905年》一書中闡述了他的“不斷革命”的論點是：“直接擺在俄國革命面前的，雖然是資產階級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無產階級執掌政權，革命就不能解決它當前的資產階級任務。而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後，又不能以革命的資產階級範圍來限制自己。恰好相反，無產階級先鋒隊正是為了保證自己的勝利，還在它自己統治的初期，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所有制。在這種情形下，它不僅會同那些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初期支持過它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衝突，還會同那些協助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衝突。在農民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落後國家內，工人政府所處地位的矛盾，只能在國際範圍內即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舞臺上，才能求得解決。”<sup>22</sup>

列寧批評李可夫說：“李可夫同志說，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沒有過渡時期。這是不對的。這是背離馬克思主義。”<sup>23</sup>

而托洛茨基主張在民主革命勝利後掌權的無產階級，要“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遭到列寧的反駁。但是在列寧去世後，斯大林廢止了列寧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實行了托洛茨基的“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在中國，毛澤東在1953年以前，確實按照列寧的革命階段論和中國共產黨七大批准的〈論聯合政府〉報告，堅持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堅持革命階段論。但是1953年以後毛澤東發動了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執行了托洛茨基的“最深刻地侵犯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的“不斷革命論”，也像托洛茨基預計的那樣，同“革命鬥爭初期支持過它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衝突”，而且和“那些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發生敵對的衝突”，終於使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資本主

<sup>22</sup> 鄭超麟：《史實與回憶》第三卷，天地圖書公司1998年，第239頁。

<sup>23</sup> 《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61頁。

義工商業消滅了，資產階級所有制消滅了，土地改革後農民耕地私人所有制也消滅了，農民在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社會主義革命、共產主義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了幾千萬人。社會主義革命的痛苦實驗教育了人民和領導人。鄧小平提出了改革開放政策，實際上回到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國家資本主義，回到了“革命階段論”，同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告別了。因此，鄧小平主張“不爭論”。實際上 20 世紀初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爭論，到 21 世紀仍然一直悄悄地或者公開地在中國延續著，直到今天。只能說，這是悲劇，而不是鬧劇。也許中國的理論家需要重新高舉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回答姓社還是姓資的無休止的爭論。

## 十、一個國家能不能單獨建成社會主義？

國外學者也關注在“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中，不能迴避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與現實問題是：馬恩列斯曾經發表過一系列重要的極有說服力的論述，說明社會主義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勝利，一個國家不能單獨建成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陣營已經解體的嚴峻國際環境中，中國還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單獨建成社會主義？

（一）建成社會主義的政治條件，不等同於經濟條件。

列寧在 1918 年 5 月 5 日的〈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中指出：

歷史（除了孟什維克這類頭號蠢人，沒有人期待歷史會順利、平靜、輕易、簡單地產生出“完全的”社會主義來）發展得如此奇特，到 1918 年竟產生分成兩半的兩個社會主義，兩者緊挨著，正如在國際帝國主義蛋殼中兩隻未來的雞雛，德國和俄國在 1918 年最明顯地分別體現了具體實現社會主義的兩方面具體條件：一方面是經濟、生產、社會經濟條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條件。

如果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獲得勝利……就一定能不經過困難或只經過極小的困難而實現社會主義的勝利……

在俄國所佔優勢的正是小資產階級資本主義，從這種資本主義無論走向國家大資本主義或者走向社會主義，都是經過同一條道路，都是經過同

一個中間站，即我們所說的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全民的計算和監督。

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會犯不可饒恕的經濟錯誤，他們或者是不瞭解具體事實，看不到實際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視現實，或者是只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抽象地對立起來，而不研究目前我國這種過渡的具體形式和步驟。

社會主義無非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再向前跨進一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充分的物質基礎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階，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在這一級和叫作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沒有任何中間級。<sup>24</sup>

很明顯地，列寧是將實現社會主義的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區別開來的。德國具有實現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而不具備政治條件，即使德國共產黨 1918 年發動了社會主義革命，成立了蘇維埃政權，最終仍然失敗。俄國具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條件，發動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但是不具備經濟、生產、社會經濟條件，最終蘇聯的社會主義也沒有建成。中國批修正主義時認為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海外有的學者認為蘇聯是特權階級統治的斯大林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到 20 世紀 90 年代由於多種原因而退回到傳統的資本主義。

（二）恩格斯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在一切文明國家裡同時發生，而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發生。

恩格斯 1847 年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回答第 19 個問題“這種無產階級革命能不能單獨在某個國家內發生呢？”時，答道：

不能！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繫起來，致使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個國家的事變的影響。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得不相上下，以致無論在什麼地方，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我們這一時代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

---

<sup>24</sup> 列寧：〈論“左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列寧全集》第 34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279~280 頁。

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裡，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工業較發達，財富積累較多，以及生產力較高而定。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的國家，會完全改變並特別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sup>25</sup>

共產國際和蘇聯、中國、古巴等國的共產黨都堅信社會主義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建成，因此都曾經大力輸出革命，希望擴大社會主義陣營，期望發動世界革命，企圖使一切文明國家同時發生革命，都變成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由於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不成熟，並沒有出現世界革命。因為，一切社會形態，包括資本主義在它所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絕不會滅亡的。

（三）列寧多次強調，沒有世界革命，俄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是沒有希望的。

1917年3月列寧在〈給瑞士工人的告別信〉中說：

俄國是一個農民國家，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之一。在這個國家裡，社會主義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勝利。但是，在貴族地主大量土地沒有觸動的情況下，在有1905年經驗的基礎上，俄國這個國家的農民性質能夠使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具有鉅大的規模，並使俄國革命變成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變成進到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級階梯。

俄國無產階級單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勝利地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但它能使俄國革命具有浩大的聲勢，從而為社會主義革命創造極好的條件，這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意味著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這樣，俄國無產階級就會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實的、最可靠的戰友——歐洲和美洲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易於進入決戰。<sup>26</sup>

1918年3月列寧在俄共七大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中說：

---

<sup>25</sup>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221~222頁。

<sup>26</sup> 《列寧全集》第29卷，第90~91頁。

俄國革命最大的困難、最大的歷史課題就是：必須解決國際任務，必須喚起國際革命，必須從我們僅僅一國的革命轉變成世界革命。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個任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從全世界歷史範圍來看，如果我國革命始終孤立無援，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那麼毫無疑問，我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是沒有希望的。

能把我們從所有這些困難中拯救出來的是全歐洲革命。

只有當目前到處都在成熟起來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完成的時候，我國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難才能被戰勝，這樣說是完全無可爭論的。<sup>27</sup>

1918年3月，列寧在俄共七大說：

絕對的真理乃是：若無德國革命，我們就要滅亡。也許我們不是滅亡在彼得堡，不是滅亡在莫斯科，而是滅亡在海參崴（海參威），或在其他更遙遠的地方，我們是撤退到那些地方去的。然而無論變化如何，德國革命若不起來，我們總要滅亡，這是絕對的真理。

最大的歷史問題乃是必須激起世界革命。<sup>28</sup>

1918年4月列寧〈在莫斯科工人、農民和紅軍代表蘇維埃的講話〉：

我們所以走在前面，……僅僅是因為我們曾是世界最落後的國家之一。

我們的落後使我們走在了前面，而如果不能堅持到其他各國工人起來大力支持我們，我們就會滅亡。<sup>29</sup>

1918年7月列寧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說：

我們的努力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sup>30</sup>

我們在國際範圍內、在世界範圍內做了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政府所沒有做過的革命工作，但是我們並沒有欺騙自己，以為靠

---

<sup>27</sup> 《列寧全集》第34卷，第6、8、9頁。

<sup>28</sup> 《列寧全集》第34卷，第12頁。

<sup>29</sup> 《列寧全集》第34卷，第219頁。

<sup>30</sup> 《列寧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頁。



一個國家的力量就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知道：我們的努力必然會導致世界革命；帝國主義政府發動的戰爭不可能靠帝國主義政府的力量來結束。這場戰爭只有靠全體無產階級的努力才能結束……

這個任務造成了特別嚴重而危急的情況，因為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任何一個國家都還沒有開始……<sup>31</sup>

我們從來不抱幻想，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不管多麼英勇，多麼有組織有紀律，我們也不認為只靠他們自己就能夠推翻國際帝國主義。要做到這一點，只有依靠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共同努力。<sup>32</sup>

戰爭已陷入無法解決的僵局。這種僵局使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堅持到世界革命爆發，這方面的保證則是只有工人群眾才能結束的戰爭。<sup>33</sup>

1919年3月列寧在俄共八大說：

我們不僅在一個國家內生活，而且是在好多國家構成的一個系統內生活。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期存在是不可想像的，歸根到底，兩方面之中必有一方面消滅了另一方面。<sup>34</sup>

1921年7月5日列寧在〈關於俄共策略報告〉中說：

我們並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界上。我們是作為世界經濟的一員生存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體系中。一方面是殖民地國家，它們還不能幫助我們；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國家，它們是我們的敵人。現在形成了某種均勢，很不可靠的均勢。但我們還是應當考慮這個事實。我們要生存，就不應當閉眼不看這個事實。或者是立刻戰勝整個資產階級，或者是向他們繳納重賦。<sup>35</sup>

---

<sup>31</sup> 《列寧全集》第35卷，第8頁。

<sup>32</sup> 《列寧全集》第35卷，第7頁。

<sup>33</sup> 《列寧全集》第34卷，第357頁。

<sup>34</sup> 列寧：〈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6頁。

<sup>35</sup> 《列寧全集》第42卷，第40、51頁。

從 1917 年直到 1991 年蘇聯解體，生存了近 70 年，在歷史長週期看，確實是單獨一國難以建成社會主義。如列寧所說，“沒有世界革命，我們總要滅亡”，也證明沒有世界革命，沒有充分而必要的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在一個國家是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斯大林 1924 年的《論列寧主義基礎》說過：“沒有幾個先進國家的無產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在一個國家內取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呢？不，不能。為了推翻資產階級，一個國家的努力就夠了，這是我國的革命和建設給我們的證明。為了獲得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為了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單靠一個國家就不夠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要有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共同努力。”<sup>36</sup> 在 1924 年秋天，斯大林把上面這段話改寫了，把“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改成“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但“不等於保證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最後勝利”。斯大林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至少必須有幾個國家內革命的勝利。”

歷史的事實與痛苦的實踐證明，恩格斯、列寧的一國不能單獨建成社會主義的理論是正確的。即使蘇聯建立了社會主義陣營，也沒有建成社會主義，沒有取得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和最後勝利，最後亡黨亡國，傳統的資本主義復辟，由社會帝國主義的特權階級統治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傳統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名存實亡變成實亡名也亡了。

在中國理論界爭論“姓社還是姓資”時，是否也值得研究這個“一個國家能否單獨建成社會主義和鞏固勝利果實”的老問題及蘇聯的教訓呢？也許會使人們從中獲得啟示，重新評價新民主主義的重要意義，因為它既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的領導權，又正確界定了中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幾十年到上百年，仍然是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仍然是新式的三民主義，跳出現在“政治上說的社會主義，經濟上幹的是資本主義”的尷尬處境。總之使思想打破牢籠，得出符合實際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結論，不必讓教條束縛活人的思想，何苦削足以適履。老百姓說得好：“活人總不能讓尿憋死”。提出這些枯燥的陳舊的理論問題，是因為列寧講過：“如果一個人從他自覺

---

<sup>36</sup> 鄭超麟：《史實與回憶》第三卷，第 305 頁。

運用一定原理出發犯了錯誤，那麼不找出他犯錯誤的理論根據，就無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錯誤，包括政治錯誤在內。”<sup>37</sup>

## //、鄧小平說：“中國的社會主義，事實上還不夠格”， 2049年“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

（一）要堅持鄧小平的理論：“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

鄧小平教導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事實上還不夠格”，必須等到生產力進一步發展，人均國民生產總產值“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sup>38</sup> 因此，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教導，必須堅持鄧小平的理論，當然必須堅持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的論點，必須堅持鄧小平確定的“真的搞了社會主義”的定量標準：“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按照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代領導人堅持的時間表，中國將在2050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將是中國歷史上重大的轉折點：將會真的搞了社會主義。這樣，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鄧小平強調提高生產力、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的重要性的原因。因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如果沒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就沒有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不是“真的搞了社會主義”，也可以說不是社會主義，是列寧說的“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和毛澤東說的“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當然不能說也不必說2049年前只是“假的搞了社會主義”。

（二）同20世紀60年代批判定性為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南斯拉夫比較。

國外學者回憶，反修鬥爭時，中國問過：20世紀60年代的蘇聯、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根據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戰鬥性很強的“九評”等一系列文章的論點與邏輯，可以對事實進行比較和分析，

<sup>37</sup> 列寧：〈再論工會、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列寧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5頁。

<sup>38</sup> 鄧小平：〈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1987年4月26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208頁。

中國現在是不是“真的搞了社會主義”。在 2049 年以前是不是“真的搞了社會主義”？當年，中國共產黨在〈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的《人民日報》、《紅旗》社論中，引用的批判南斯拉夫是資本主義復辟的修正主義國家的論據與事實主要是：

1953 年，“鐵托集團”從稅收方面鼓勵地方政權扶植私人資本。

1961 年，“鐵托集團”規定私人有購買外匯的權利。

1963 年，“鐵托集團”的憲法規定，私人可以創辦企業，僱傭勞動力。城市私人企業和私人資本家雨後春筍似地發展起來。

“鐵托集團”承認有些私有者僱工，比規定的五人多 10~20 倍，甚至達到 500~600 人。

1961 年貝爾格萊德有的企業主，一年內得到了十萬美元的收入。

南斯拉夫城市中，不但有私人工業、商業、服務企業，還有私人房產業、私人運輸業、私人銀行家的高利貸者。

中國共產黨的評論中指出：“所有這些，都是無可置疑的事實”，正是這些事實回答了“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的政治問題。得出了的結論是，南斯拉夫以及蘇聯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資本主義國家、修正主義國家。如果堅持當年“九評”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立場，那麼，同樣的邏輯、事實與結論也應適用於現在的中國。

（三）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原則分析中國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

按勞分配是社會主義的一項基本原則，而中國實行的是毛澤東講的“八級工資制”，“與舊社會差不多”。而改革開放後，中國分配原則更重視中外資本家的“按資分配”、“按股分配”，不是巴黎公社的部長與工人拿同樣工資的原則。對於一億農民工更沒有實行同工同酬的制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陸學藝的估計，一個農民工平均年工資收入約為五千元，創造了 2.5 萬元的產值，相當於每個農民工以剩餘勞動創造了兩萬元的剩餘價值。一億農民工平均每年為社會、企業創造了兩萬億元剩餘價值。這兩萬億元剩餘價值是支撐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基礎，出口廉價製造業產品的必要條件。

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中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國家，龍永圖說過：就是市場經濟國家，這樣中國才能加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聯盟 WTO——世界貿易組織，還決定遵守它制定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共同規則。我們還在努力爭取一個又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國家。

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所有制是決定社會制度的根本標誌。而現在中國的公有制主要掌握金融、電力、鐵路、土地等關係國家命脈的一些經濟部門和資源，實際上私有制在經濟中佔有很大比重，如果不是 2004 年對國企改革的爭論，早賣掉不少大型國營企業了。

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目標與標誌。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高農民收入方面取得明顯成就的同時，城鄉、工農差別擴大了，一位外國駐華大使對記者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從 2001 年以來，農民平均純收入只有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近年這個比例一直在降低中。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不同於資本主義的一項重要原則。事實上，中國貧富兩極分化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基尼係數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 0.4。聯合國的材料，1998 年收入最高的 20% 居民掌握的全部居民收入的百分比，中國為 42.6%，超過美國的 42.4%。<sup>39</sup>這與社會主義追求的共同富裕目標相差甚遠。

除了上述最基本的確定社會主義的原則以外，還有不少判定和區別“姓社還是姓資”的原則，如果用這些原則來衡量中國的現實社會經濟狀況，人們一定會完全贊同鄧小平的估計，中國的社會主義確確實實是“事實上還不夠格”的社會主義，不夠格，就是不及格，等於“不是”。人們也一定會同意鄧小平的預言：“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即在 2050 年以後，中國“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也就是說，在 2049 年以前，中國的學者不要自以為是的以為自己“真的搞了社會主義”，因為實際上搞的並不是“真的搞了社會主義”的所謂社會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資本主義，列寧講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且，不應忘記列寧在一百年前

---

<sup>39</sup>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1 年人類發展報告》，第 180 頁。

的深刻預言：“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以商品生產為基礎，並且和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交換關係的社會，在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時，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裡，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發展得不夠。因此，工人階級和資本主義的最廣泛、最自由、最迅速的發展有絕對的利害關係，消滅一切妨礙資本主義廣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發展的舊制度的殘餘，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sup>40</sup>

（四）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理想的保證。

對“姓社姓資”爭論不休，有時也惹來是非，無限上綱。最基本的一個原因就是，在中國現實情況下，鄧小平說過“四個堅持的核心，是堅持黨的領導。”<sup>41</sup> 要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與靈魂。堅持社會主義，在現實中，還表現為堅持社會主義的理想，公正、公平、平均、小康、大同等美好的人類理想。現在，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既是保證社會穩定的大局，也是堅持美好的社會主義理想的保證。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可以支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漸進式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可以提出各種改革方案，允許爭論，不必泛意識形態化急急忙忙地貼上各種政治標籤或者嚇死人的政治罪名。思想家出思想，不必承擔責任；政治家從中選擇、判斷，作出決策，決策者負決策的責任。這樣，決策才能民主化科學化，才有利於社會民主化，也有利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同時也提高了黨的領導能力和威信。

## 12、江澤民說：“要加強對當代資本主義自我調節和發展的研究”

不少學者認為對待“姓社還是姓資”，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首

---

<sup>40</sup>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列寧選集》第一卷，第540~541頁。

<sup>41</sup>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261頁。

要的是擺脫“惟上”、“惟書”的思想束縛和思想壓力，不能“向著實事求是來，背著實事求是學，繞著實事求是走，對著實事求是幹”。對於歐洲，特別是北歐社會黨成功的社會主義實踐不要輕易指責為“修正主義”的異端邪說，“要尊重各國社會黨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努力。”<sup>42</sup> 鄧小平指出：“歐洲共產主義是一個新事物。我們歷來認為，凡是新事物都要通過今後的實踐去檢驗。”“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我們尊重各個國家、各個地區共產黨自己的選擇，他們應該根據自己國家或地區的特點，制定自己的方針、政策。歐洲共產主義究竟怎樣，將來實際結果會怎樣，要通過他們自己實踐經驗得出結論。”<sup>43</sup> 江澤民近年多次引用恩格斯在〈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的觀點：“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經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由許多人聯合負責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麼，那裡不僅沒有了私人生產，而且沒有了無計劃性。”江澤民指出：“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在自身發展中是會出現變化的，我們應該正確認識並從理論上說明這些變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和發展，對資本主義關係的某些環節和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運行、管理機制做了不少自我調節、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鑒社會主義的一些做法，從而使得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能夠容納現實的生產力，而且生產力還在發展，資本主義統治下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緩解。”因此，我們“要加強對當代資本主義自我調節和發展的研究，作出有說服力的理論分析，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否則，“閉目塞聽，坐井觀天，因循守舊，墨守成規，無視世界發展潮流，必然會落伍。”<sup>44</sup>

一切資本主義，從原始積累的野蠻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金融資本的現代資本主義，從各種類型極權制度下的法西斯資本主義到斯大

---

<sup>42</sup> 李興耕：《當代西歐社會黨的理論與實踐》，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頁；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第59頁。

<sup>43</sup> 《鄧小平年譜》，第155~156頁。

<sup>44</sup> 江澤民：《論三個代表》，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8、57、131頁。

林時代與後斯大林權貴資本主義，最嚴重的社會矛盾是兩極分化，即馬克思指出的“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sup>45</sup> 造成“兩極分化”的僱傭奴隸制，是使勞動者受折磨、痛苦、摧殘的災難。解放了被嚴重束縛的生產力，也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弱勢群體的對抗、階層和階級的衝突及社會動蕩。拉丁美洲、亞洲的一些國家，資本主義較發達的國家的歷史教訓證實了這一點。因此，在一些經濟發達國家，被迫採取調節國民收入分配、加強社會福利、發展中產階級等措施，以緩解兩極分化的矛盾。這些措施實際上符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黨提出的遠景計劃中的原則，如累進所得稅、遺產稅、免費義務教育、免費醫療、退休金制度等。由於加入WTO發生的農民損失，美國有給予農民補貼的政策，在這些方面，不要全盤否定，因為這些措施對本國的無產階級有利。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就應當在社會主義國家實行比資本主義更好更優越的社會福利保證措施和公平地進行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稅收與支出政策。應當實行完全免費的義務教育、早應免除農民的農業稅、煙草稅和更多的隱性負擔。對於生產力提高後才能實行的普遍的社會福利制度，證明了生產力是決定性的，生產力更高的資本主義比生產力很低的貧窮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對人民更有實惠，“人民公社好”的時代卻非正常死亡幾千萬人。經過幾十代人的努力，中國未來的社會，肯定比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發達國家更富裕、更幸福、社會福利水平更高。

王佔陽在《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中提出，“社會主義就是普遍幸福主義，使社會成員都能過上幸福生活。效率、公平、自由、民主、人權、博愛、福利、正義等都是社會主義的價值。”<sup>46</sup> 從資本主義國家的上述有利於普遍幸福的政策措施看，“既然克服舊資本主義的嚴重的兩極分化，使人民普遍過上比較富裕文明的生活是完全符合普遍幸福主義的根本原則的，既然實行宏觀調控，建立比較文明的經濟秩序也是符合廣

---

<sup>45</sup>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8頁。

<sup>46</sup> 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2~3頁。



大人民的普遍利益和願望的，既然這種重大變化又主要地是由社會主義者和廣大勞動人民的長期奮鬥所爭取來的，既然是這樣，那麼這種變化當然就不是或主要的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而主要是一場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改革。”<sup>47</sup> 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私營企業主階級和政治家“對於廣大勞動人民和社會主義政治勢力的強大壓力所做出的歷史性的讓步，只能證明它是新社會主義戰勝舊資本主義的偉大勝利。”“‘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節，而不是‘資本主義’的自我調節，不是資本家發善心，而是強大的、理智的社會主義勢力有力地、反復地‘修理’了資本主義，迫使資本主義勢力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忍痛割愛’步步退讓，因而也就使得這種社會逐漸地告別了舊資本主義的歷史時代，而進入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相結合的新時代。”<sup>48</sup> 資本主義不斷地向社會主義方向和平演變，世界上正在靜悄悄地卻在成功地、順利地發生著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和平演變，這是一種反向“橙色革命”、“粉紅色革命”。

王佔陽認為：“實事求是地承認西方社會內部社會主義性質方面的客觀存在，也是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的客觀需要。”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馬克思、恩格斯對於西方 19 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當成了千古不變的教條，無視或不願正視 20 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結束以來西方社會主義事業長足發展的客觀事實，不是實事求是地認識和承認西方生活的兩重性。”“這種重大戰略失誤的極其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把高水平的社會保障、公民的普遍富裕、廣泛的政治參與、良好的精神文明狀態等等一系列本來屬於社會主義範疇的美好事物，統統掛在了資本主義的名下，就是給資本主義貼了金，給社會主義抹了黑（社會主義事實上被置於這些美好事物的對立面），就是越來越多的人相信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更好，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糟；就是使越來越多的人感覺資本主義正在蒸蒸日上，社會主義則已氣息奄奄，僅剩下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也只有走有本國特色的舊資本主義道路才有出路，就是使越來越多的人喪失了社會主義

---

<sup>47</sup> 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 83~84 頁。

<sup>48</sup> 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 84 頁。

的理想信念，因而也就從根本上動搖了我們的立國之本。”“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勇於和善於糾正我們自己的錯誤。實事求是地承認西方社會內部的這些美好事物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就證明了社會主義是美好的、可愛的，我們應該堅持和發展新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從中國實際出發，堅定不移的走有中國特色的新式社會主義的道路。”<sup>49</sup> 堅持“真正的毛澤東思想和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論’”，“走新民主主義——新式社會主義的社會發展道路”<sup>50</sup>，走毛澤東說的“新資本主義”的路，也就是新民主主義道路。

### 13、毛澤東說：“惟一的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毛澤東早在 20 世紀 40 年代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政治理論，回答了建國以後爭論至今，還可能爭論下去的“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他的結論是新民主主義，“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和“新式資本主義的經濟”。毛澤東指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出路：“在中國建立的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和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在一定歷史時期中所採取的國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過渡的形式，但卻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sup>51</sup> 這個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而“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原則上不同的。”毛澤東強調這是“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sup>52</sup>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基本勝利後，既不應當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應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

<sup>49</sup> 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 63~64 頁。

<sup>50</sup> 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 380 頁。

<sup>51</sup>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52 年 8 月（1966 年 7 月改橫排本），第 636 頁。

<sup>52</sup> 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 296 頁。

應當建立無產階級參加領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社會並不是轉瞬即逝的過渡時期或過渡性社會，而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獨立的社會制度或社會形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存在時間，預計可達幾十年乃至上百年。所謂新民主主義，顧名思義，就是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亦可稱為新資本主義或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sup>53</sup>

毛澤東說：“有些人懷疑共產黨得勢後，是否會學俄國那樣，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制度。我們的答復是：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原則上的不同的。……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在一個長時期中，將產生一個對於我們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時又區別於俄國制度的特殊形態，即幾個民主階級聯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態和政權形態。”<sup>54</sup>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政治理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經濟上非社非資的第三條道路：新民主主義經濟，這是一種“新式資本主義的經濟。”“新式資本主義的經濟，區別於資本主義經濟，也區別於社會主義經濟。”毛澤東還指出：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各種成份中，“國營經濟與合作社經濟是應該發展的，但目前這樣的不是國營而是民營，而是讓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得著發展的機會。即使最保守的美國商人，也不會在我國的綱領中發現可持異議的東西。”毛澤東還著重指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國營經濟並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新民主主義國家，就是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因此，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國營經濟，也就只能是新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即新民主主義或三民主義性質的經濟，而決不可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sup>55</sup>

對於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毛澤東認為“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展。”他明確指出：“西方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

---

<sup>53</sup> 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 288 頁。

<sup>54</sup>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 962~963 頁。

<sup>55</sup> 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 300~302 頁。

主義是沒落的，農業國家的不操縱國民生計的私人資本主義——自由資本主義則仍然是進步性質的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客觀要求：基本上依然是掃除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的障礙。”<sup>56</sup>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從封建經濟必須經過資本主義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不承認這個基本原理的俄國民粹派最終變成了“反革命”。<sup>57</sup> 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認識到：“中國必須工業化。在中國，這只有通過自由企業和外資援助才能做到。”“中國戰後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但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基礎。中國的資本主義不是太多了，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廣大發展“有益於國家和人民，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sup>58</sup>

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奢談立即進入社會主義，是‘反革命的思想’，因為它不現實，而想實行它總會自招失敗。”因為，如果“沒有廣大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50年代要求大躍進，立即進入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奢談”的理論和狂熱的革命性群眾運動的實踐，確實“總會自招失敗，破壞了生產力，因為它不現實，脫離了中國的經濟、社會實際條件與現實可能性，違背了客觀規律。”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沒有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反而破壞了生產力，當然就是“反革命的思想”。毛澤東指出“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都是過慮”。中國共產黨“提出並指導社會經濟的資本主義發展”，實行鼓勵、扶助和保護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經濟政策，是中國“最革命的政策”。<sup>59</sup> 因為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政策，就是革命的政策；最有利於

---

<sup>56</sup> 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304頁。

<sup>57</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323頁。

<sup>58</sup> 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304、305頁。

<sup>59</sup> 王佔陽：《新民主主義與新社會主義》，第305頁。

生產力發展的政策，也就是毛澤東說的“最革命的政策”。

當然，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發展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即“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必然要警惕、防止資本主義的負面作用，特別是兩極分化，要使生產發展、經濟繁榮，勞資兩利。

從上所述可見，中國的新民主主義是非資非社的第三種形式，與社會主義不同，和資本主義也有所不同，它是毛澤東指出的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毛澤東早已回答了 21 世紀中國網上討論、學者爭論、政治家在思考的“姓社還是姓資”的難題。

毛澤東在 61 年前的 1945 年 4 月 24 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發表了一篇極為重要，至今仍有重大意義的講話，強調“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廣大的發展。”

毛澤東說：

有些人不瞭解共產黨人爲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於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於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說也奇怪，有些中國資產階級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而要轉彎抹角地來說這個問題。另外有些人，則甚至一口否認中國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必要的發展，而說什麼一下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什麼要將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畢其功於一役”。很明顯地，這類現象，有些是反映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有些則是反映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於民眾的欺騙手段。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及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廣大發展的順利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向前發展。對於中國共產黨人，

任何的空談與欺騙，是不會讓它迷惑我們的清醒頭腦的。<sup>60</sup>

中國革命不能不做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而且第一步的時間是相當地長，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不能離開當前的實際條件。<sup>61</sup>

如果說，民主革命沒有自己的一定任務，沒有自己的一定時間，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個時間去完成的另一任務，例如社會主義的任務，合併在民主主義任務上面去完成，這個叫“畢其功於一役”，那就是空想，而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sup>62</sup>

雖然，中年毛澤東就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的這個主旋律，但是，具有清醒頭腦的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沒有受任何的空談與欺騙的迷惑，堅定地執行改革開放政策，繼續高奏這個正確的、美好動聽又帶給人民實惠的主旋律。

#### 14、列寧關於重新建立資本主義、 通過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新經濟政策

（一）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國家通過建立資本主義過渡的論述，可能對中國的現實有所啓示。

列寧說：“掌握政權，就可以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如：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也可以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列寧說：“我們不應該指望直接採用共產主義的過渡辦法。必須以同農民個人利益的結合為基礎。”<sup>63</sup>

列寧說：“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是對立的，然而從兩種對立的觀點來看，（盧布穩定，農民生產和輕工業生產活躍，國家銀行開始獲利）這些情況都是好現象，怎麼可能有這樣的事情呢？這是可

<sup>60</sup>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951~952頁。

<sup>61</sup>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44頁。

<sup>62</sup>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46頁。

<sup>63</sup> 列寧：〈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列寧全集》第42卷，第190頁。

能的，因為向共產主義的過渡也可以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只要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這正是我們現在的情況。”<sup>64</sup>

（二）列寧說：“先實行國家資本主義那就好了。不退卻，就有滅亡的危險。”

列寧認為，俄國 1918 年經濟制度中有以下幾種成份：“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農業；2、小商品生產（這裡包括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3、私人資本主義；4、國家資本主義；5、社會主義。”“那時我給自己提出了一個任務，要說明這些成份彼此之間的關係和是否應當把非社會主義成份之一即國家資本主義看得高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宣佈為社會主義的共和國裡，竟把一種非社會主義成份看得比社會主義還要高，還要優越，這在大家看來是非常奇怪的。”“如果我們當時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認識到，如果我們先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然後再實行社會主義，那就好了。”<sup>65</sup> 1921 年我們“遇到了蘇維埃俄國內部很大的——我認為是最大的——政治危機。這個內部危機不僅暴露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的不滿，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滿。這種特殊的極不愉快的情況是由什麼引起的呢？”“是因為我們在經濟進攻中前進得太遠了，我們沒有給自己留下足夠的基地；群眾已經感到的，我們當時還不能自覺地表述出來。但是，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很快就認識到了，這就是：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如果我們不能實行退卻，即把任務限制在較容易完成的範圍內，那我們就有滅亡的危險。”“這次退卻對我們是不是有利，是不是真正拯救了我們，或者結果還不清楚呢？這個主要問題對於各國共產黨也有頭等重要意義。因為回答如果是否定的，那我們就注定要滅亡了。我認為，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對這個問題作肯定的回答，就是說過去的一年半，絕對肯定地證明我們經受住了這一考驗。”<sup>66</sup>

---

<sup>64</sup> 列寧：〈答曼徹斯特衛報記者何·蘭賽姆問〉，《列寧全集》第 43 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259 頁。

<sup>65</sup> 《列寧全集》第 43 卷，第 275、276 頁。

<sup>66</sup> 《列寧全集》第 43 卷，第 277~278 頁。

（三）列寧反思失誤：“上層制定的經濟政策同下層脫節，沒促成生產力的提高。”

列寧在〈戰略退卻〉中說新經濟政策“在實質上它比我們先前的經濟政策包含著更多的舊東西。”

列寧承認在 1918 年犯了錯誤：決定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

當時我們認定，農民將遵照餘糧收集制交出我們所需數量的糧食，我們則把這些糧食分配給每個工廠，這樣，我們就是實行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了。經過一段不很長的試驗，我們終於確信，這種構想是錯誤的，是同我們以前關於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論述相抵觸的，以前我們認為，不經過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計算和監督的時期，既使要走到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也是不可能的。

要從資本主義社會走上接近共產主義社會的任何一條通道，都需要有社會主義的計算和監督這樣一個過渡，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渡（資本主義社會愈不發達，所需要的過渡時間就愈長）。

新經濟政策的實質正在於，我們在這一點上，遭到了嚴重的失敗，開始做戰略退卻……<sup>67</sup>

在經濟戰線上，由於我們企圖過渡到共產主義，到 1921 年春天我們就遭到了嚴重的失敗，這次失敗比高爾察克、鄧尼金或皮爾蘇茨基使我們遭到的任何一次失敗都嚴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險得多。這次失敗表現在：我們上層制定的經濟政策同下層脫節，它沒有促成生產力的提高，而提高生產力本是我們黨綱規定的、緊迫的基本任務。<sup>68</sup>

（四）列寧說在無產階級國家裡，“國家資本主義有利於工人階級。”

列寧在〈關於俄共策略的報告〉裡說：“貿易自由就是資本主義自

---

<sup>67</sup> 《列寧全集》第 42 卷，第 181、182~183 頁。

<sup>68</sup> 《列寧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10 月，第 184 頁。



由，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建立資本主義。這裡我們碰到一個棘手的問題。實物稅意味著貿易自由。農民在交完稅之後，有權拿自己的餘糧去自由進行交換。這種交換自由意味著資本主義的自由。……貿易自由就是資本主義自由，然而這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新的形式。這就是說，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重新建立資本主義。我們完全是公開這樣做的，這就是國家資本主義。但在政權屬於資產階級的社會裡的國家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國家裡的國家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資本主義國家裡，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得到國家的認可並受國家的監督，從而有利於資產階級，而不利於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國家裡，做法相同，但是這有利於工人階級，目的是為了同依然很強大的資產階級的抗衡和鬥爭。不言而喻，我們必須讓外國資產階級、外國資本獲得承租權。我們在絲毫不取消國有化的條件下把礦山、森林、石油資源租給外國資本家，以便從他們那裡得到工業品、機器等來恢復我們的國家。”<sup>69</sup>

（五）列寧說：“每次革命都會給革命階級帶來鉅大的犧牲。”

自然，每次革命都會給進行革命的階級帶來鉅大犧牲。革命不同於普通鬥爭的地方就在於投入運動的人要多出十倍百倍，就這一點講，一次革命不僅僅對某些個人，而且對整個階級都意味著犧牲。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給統治階級即無產階級帶來的犧牲和困苦在歷史上是空前的，很有可能其他任何國家的革命將來也會是這樣。

我們怎樣來分配這些生活困苦的負擔呢？我們代表著國家政權，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能夠分配這些負擔，即把負擔分攤在幾個階級身上，從而相對地改善居民中個別階層的處境。但是我們應當根據什麼原則行事呢？根據公平的原則還是根據多數的原則呢？不，我們應當講求實際。我們應當以保住無產階級政權為前提來進行分配。這就是我們惟一的原則……<sup>70</sup>

上述列寧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論述，可能適用於現在的中國，也有助於深化“姓社姓資”的改革方向的討論。

---

<sup>69</sup> 《列寧全集》第42卷，第50~51頁。

<sup>70</sup> 《列寧全集》第42卷，第48頁。

## 15、鄧小平說：“為什麼不回顧一下建國以來 我們黨犯了哪些極嚴重的錯誤？”

當前確實應當回顧、反思 1949 年以來中國的歷程。中國從哪裡來？現在何地？走向何方？回顧成就也要反思教訓，判斷是非、好壞的標準是毛澤東提出的生產力標準。

毛澤東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於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sup>71</sup> 按毛澤東提出的這個標準，回顧建國以來的歷程：

兩者必居其一：1953 年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消滅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還是 1978 年改革開放後重新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重新產生資產階級有利於中國生產力的發展？

兩者也必居其一：1953 年後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農業集體化、人民公社化，消滅個體小農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還是 1978 年以後撤銷人民公社、重新發展個體農戶經濟有利於生產力的提高？

兩者必居其一：是“新民主主義社會一天也不要”、“三年建成共產主義”的結論正確？還是“新民主主義需要幾十年上百年”的判斷正確？

實踐證明，同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各種脫離實際的方針、政策背道而馳的改革開放政策是正確的。實踐證明農業包產到戶、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革開放的政策，在 1978 年以來使中國的生產力得到了歷史性的真正躍進。對“姓社姓資”的爭論，以束縛還是解放生產力為標準的實踐已經作了回答。

鄧小平正確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發展生產力。”他又正確地指出：“毛澤東同志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

---

<sup>71</sup>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 980 頁。

視發展生產力。”<sup>72</sup> 也就是批評毛澤東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當然也就是沒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這樣“重大的缺點”，當然違反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最基本原則，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破壞了生產力的農業、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當然不是符合實際的。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一切政策、方針的方向是正確的，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

因此，1992年鄧小平對香港知名人士的談話更是正確的：

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廠快些關閉，帽子拿給我來戴。如果說把經濟建設列為黨的基本路線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資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資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學習和借鑒工業國家的先進管理、先進經驗、先進技術，擴大和搞活市場經濟是搞資本主義，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資派。其實，我這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是學資本主義來搞好自己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抽象的。落後、貧困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能長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臺的。我要請教那些“馬列主義理論權威、經濟權威、堅定的馬列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捍衛者”，你們到底讀了多少馬列的書，研究了多少馬列主義的理論？為什麼不回顧一下建國以來我們黨犯了哪些極嚴重的錯誤？<sup>73</sup>

這段話啟示中國人：中國從哪裡來？現在位於何地？向何處去？建國以來有哪些錯誤？改革需要改錯，改哪些錯？如何走下一步棋？採用何種方法？達到什麼目標？一百年、五百年後的中國發展的大戰略是什麼？……都值得中國探索。

在對改革爭論、探索和艱苦實踐過程中，最重要的是社會穩定，不要添亂。我們有位主管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宣傳的負責人，在論證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復甦將重新出現時所引用的證據是尼泊爾、菲律賓、墨西哥、哥倫比亞、秘魯等“左”派（“毛派”）社會主義革命游擊隊不斷取得勝利，威脅了這些國家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統治政權。特別提到美國給了尼泊爾政府幾千萬美元，結果尼泊爾反

<sup>72</sup>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16頁。

<sup>73</sup> 吳江：《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溝通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2~13頁。

政府武裝，即毛派游擊隊還取得了進展。不知道，這位負責人是否讀過這些“毛派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的黨綱、政綱及支持尼泊爾“毛派游擊隊”的“美國革命共產黨”主張社會主義革命的宣傳材料？2003年我曾在哈佛大學旁邊的“革命書店”看到過以“美國革命共產黨”（不是來我國訪問過的“美國共產黨”）為代表的這類革命綱領與讀物，其中特別重點宣傳尼泊爾等國“毛派”游擊隊武裝鬥爭的思想和成就。這些宣傳品以武裝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指導思想，以“四人幫”為精神領袖，號召世界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武裝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還特別強調毛澤東提出的，“如果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外國共產黨）怎麼辦”的問題。美國的這些紅衛兵式的極左派的回答是：幫助中國革命人民“打倒修正主義政權”、“建立毛派的黨”。<sup>74</sup> 我們主管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的理論權威怎麼能讚揚這種理論，認為極左派的理論與實踐是社會主義運動的復甦與勝利呢？套用極左派的語言，這不是在為第二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做輿論準備嗎？宣傳這種極左派的理論是有利於社會穩定與和諧，還是破壞社會穩定與和諧？這種文革式宣傳的最終結果只能是高高地舉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這位理論家實際上站到了美國極左派的美國革命共產黨的立場，讚揚尼泊爾極左派主張武裝鬥爭，反對尼泊爾政府，也反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行動，等於宣傳、讚揚、同情、支持美國革命共產黨要支持在中國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這不是有意或無意地“添亂”嗎？上面一再打招呼“不要添亂”、“要保持穩定這個大局”，這位負責領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權威，怎麼自己帶頭添亂？請注意上面的招呼：不要添亂！

## 16、毛澤東號召在中國“造成真正民主主義的政治，建設真正平等的社會，創造真正的光明世界”

---

<sup>74</sup> 姚監復：〈美國極左派宣傳文化大革命〉，美國革命共產黨《革命工人報》1990年5月29日。

一些學者認為，當前，中國是“姓社還是姓資”？姓“新”！新民主主義！要為鞏固和發展新民主主義而鬥爭。因為，毛澤東 60 年前就教育中國人民和共產黨人，俄國的民粹派要從封建經濟不經過資本主義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最後成為反革命。他認為中國要廣泛地發展資本主義，要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毛澤東在 40 年前多次引證列寧講的 20 世紀 20 年代的蘇聯是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他認為中國同舊社會差不多。中國實際上也是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改革開放後，實際上是在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存在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存在許多資產所有者的資產階級國家。一位堅持正統馬克思主義論點的老領導說：“看我住的這個大樓，這一套我買下來的私人所有的房子，按我的特殊待遇，包括小汽車、秘書，我就屬於中國的特權資產階級。而我的下崗的孫女要蹬三輪車賺點錢，維持生活。我們家已經兩極分化了。”為什麼要諱言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現實？社會主義的稱號不能代替資本主義的實質內容。斯里蘭卡國家全名為“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但是從來沒有把斯里蘭卡列入社會主義陣營。正視和承認中國現實的兩極分化和弱勢群體，才能正確地緩解兩極分化的矛盾，而不必用“社會主義”的稱號掩蓋新民主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都可能出現的兩極分化現象。如果說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首先應表現在公正、公平、平等上，表現在社會福利的保證上，表現在高勞動生產率和低基尼係數上的優越性。實際上優而未越的現實，只說明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一個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工人階級的黨掌握了政權的沒有資本家或存在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不如實事求是地承認中國仍然處在新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像毛澤東指出的那樣“新民主主義在橋上”，並沒有建成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並不是政治思想的倒退，而是承認現實。這樣做，完全符合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承認現實，才可能正確處理現實生活中的人民內部矛盾。

中國有“顏色革命”的潛在和現實危險，但用不著以私有化、

市場化為最終經濟目標的“橙色革命”，因為私有化、市場化、向外國資本開放在中國已是現實。值得擔心和提防的是“紅色革命”。因為，鄧小平教育中國共產黨人，如果兩極分化，就不是社會主義。幾億貧困人民，就不能不革命，就有內戰的危險。毛澤東在30年前的1976年6月13日接見華國鋒等人時，做了遺言式的警告：“臺灣問題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麼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sup>75</sup> 因此，為了防止血雨腥風的“紅色革命”、“內戰”的風險，必須現實地清醒地承認兩極分化的事實，這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必然出現的歷史現象，只需要正視、承認它，妥善處理好這個矛盾，而不能只讓權貴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富起來，預防可能出現尖銳的日益激化的兩極分化造成的社會矛盾。比起“橙色革命”來，防止“紅色革命”才是當務之急。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優秀的文化，湧現過許多具備高度政治智慧的思想家與政治家，特別是一代又一代勇敢地戰勝過各種災難和危險、頑強地從困境中奮起的中國各族人民。到了21世紀，受盡列強凌辱的中國，重新屹立在世界前列，中國人民將在千年難遇的歷史戰略機遇期展翅飛翔。因此，絕不能讓幾個名詞、術語、定義與語錄禁錮住聰明、勇敢的中國人民。讓思想衝破牢籠，讓老百姓自己認識真理，讓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讓民主、科學真正在中國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在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讓中國“人的現代化”走在前面，真正實現84年前毛澤東的號召，在中國“造成真正民主主義的政治，建設真正平等的社會，創造真正的光明世界。”<sup>76</sup> 這樣，偉大的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一定能在新的世紀創造出無愧於先人、世界和時代的新的輝煌的歷史。

---

<sup>75</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卷，第1782頁。

<sup>76</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所編：《毛澤東年譜 1983~1949》，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年，第105頁。